



第七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16(c)

宏观经济政策问题

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编写的报告。

* A/75/15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关于外债可持续性与发展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大会第 74/203 号决议编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核心指标最近的演变情况。2020 年初冠状病毒病 (COVID-19) 危机的爆发为这些指标蒙上阴影。本报告评估了发展中国家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的外债状况，以及疫情对其外债脆弱性的影响。鉴于这场危机的实质性影响，本报告重点介绍了供国际社会考虑的核心政策措施。

一. 引言

1. 自秘书长关于外债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最新报告(A/74/234)发布以来,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主导了全球经济的前景, 因而也主导了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的前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目前预测,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5%左右, 这远远超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萎缩幅度。¹ 这导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本已深受制约的国际收支方面同时承受各种压力, 将严重削弱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外债可持续性。

2. 令这一情况雪上加霜的是, 发展中国家在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面临外债可持续性恶化的问题, 现在又因疫情对卫生、经济和金融领域造成的影响而受到三重冲击。目前对全球经济萎缩的预测所依据的假设是, 恢复速度将比之前预期的要慢。因此,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流动性危机很可能演变为资不抵债危机。

3. 为防止出现这种结果,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在权衡健康风险与大规模封锁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成本方面, 发达国家面临严峻挑战。而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则缺乏与发达国家相当的国内政策空间, 无法以必要的规模应对 COVID-19 危机。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相对较高的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 因为它们在这些领域的基础设施原本就比较薄弱。与此同时, 这些国家严重依赖硬通货形式的外部流动性支持, 以便继续支付重要进口贸易的款项, 并偿还未偿债务。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 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为避免出现大量民众虽未染病却死于饥饿的情况, 过早地重启经济, 结果发现疫情继续蔓延, 国家在自行应对和恢复方面的政策空间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二. 疫情之前金融脆弱性的累积: 2009-2019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外债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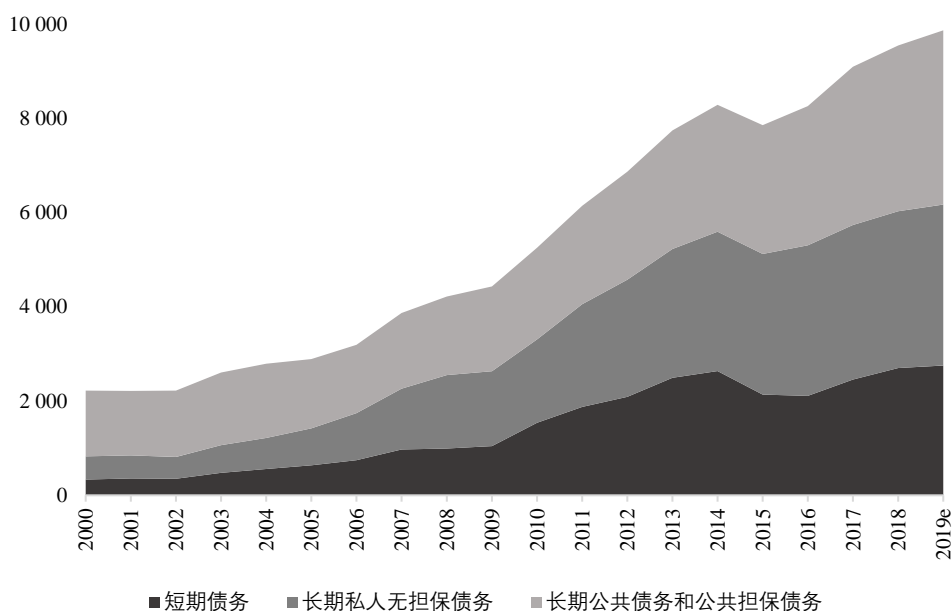
A. 金融脆弱性上升的总体趋势和共同驱动因素

4. 疫情前夕,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本报告称其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总额达到 10 万亿美元(见图一)。与 2009 年的 4.5 万亿美元相比, 这一数字增加了一倍多, 创下新的纪录。发展中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足够强劲, 但无法抵消外债的增加, 因为全球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仍然是利用短期政策刺激提高投机性投资者的预期, 以及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 而不是采用持续、包容的方式恢复总需求。因此,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从 2009 年的 25.2%升至 2019 年的 29%。如果不计入中国这个极为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2019 年外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已升至 38.3%, 因为 2019 年中国的这一比率仅为 14.8%。

¹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 2020 年 6 月。

图一
2000-2019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

(按现值计算的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资料来源提供的数据所作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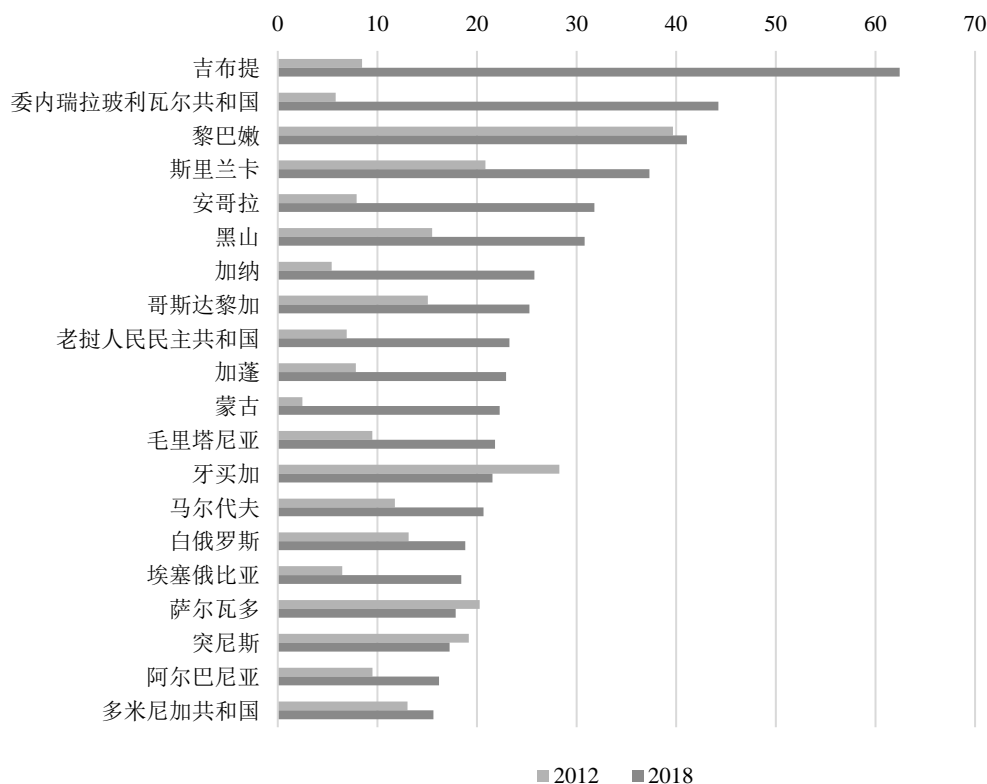
缩写：e = 估计数。

5. 不断增加的外债负担继续消耗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资源。因此，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与出口额之比从 2018 年的 105% 升至 111%，上次达到这一水平是在 2003 年。同样，偿债负担继续呈增加趋势：2019 年，发展中国家将出口收入的 14.6% 用于偿还外债欠款，这一数字高于 2011 年的 7.8%，即观察期内的最低点。政府收入方面的平均趋势较为缓和，但也在持续上升，偿还长期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外债的成本开支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 2012 年的最低点 2.7% 升至 2019 年的 4.7%。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偿还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它们面临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其中包括受到最近油价暴跌打击的石油出口国，以及债务负担沉重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

图二

2012 年和 2018 年最大的 20 个发展中经济体偿还长期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外债的支出与政府收入之比

(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发展指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所作的计算。

6.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头寸也出现期限变短和展期风险增加的情况。2019 年，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升至 29%，高于 2000 年代初远低于 20% 的水平和 2009 年的 26%。与此同时，在通过国际储备缓冲进行自保、抵御外生冲击和增加的市场风险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能力继续减弱，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几乎从 2009 年的峰值 543.9% 减少一半，降至 2019 年的 278.8%。在 COVID-19 危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令人关切，因为它表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极为有限，难以度过这场冲击引发的流动性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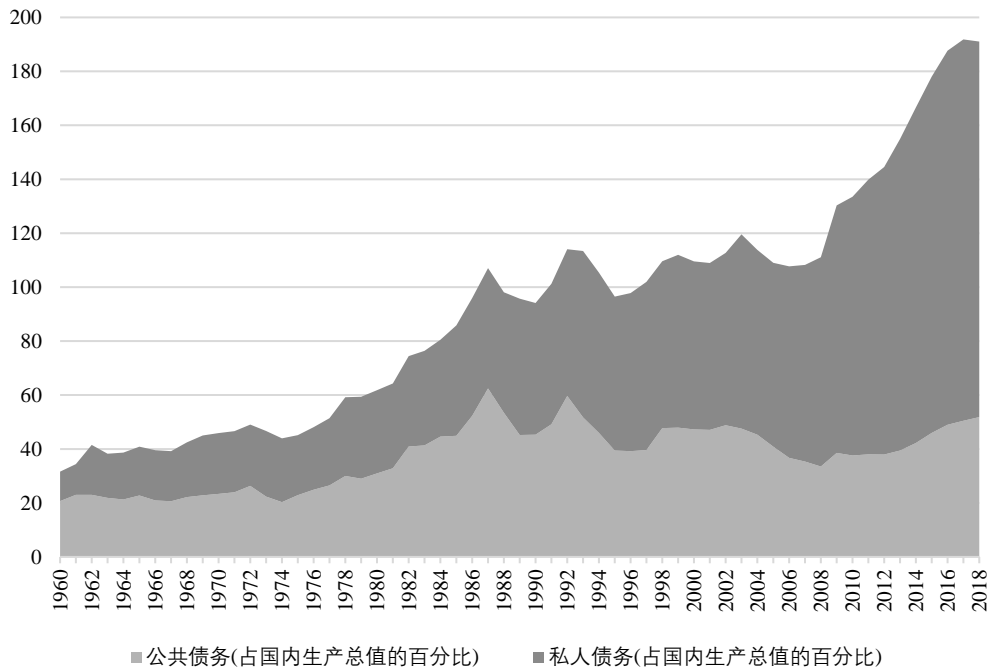
7. 此外，要有效应对 COVID-19 的冲击，就需要认识到，必须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即从发展中国家总体负债情况(外债和内债、私人和公共债务)不断恶化的趋势以及由此导致金融脆弱性整体不断上升的视角出发，看待发展中国家在外债头寸方面日益脆弱的现象。在金融快速一体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背景下，内债可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内债和外债均可以本币或外币计价，在二级和三级市场上交易的主权债券和公司债券买卖频繁，外债和内债之间的传统界限愈加模糊。

8. 如图三所示,发展中国家最近总体债务累积的最突出特点是私人债务异常增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尤其如此。2018年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存量总额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191%,创下最高纪录。虽然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8年的33.5%明显上升至2018年的51.8%,但这远低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私营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幅度。后者几乎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77.6%升至2018年的139.1%。²

图三

1960-201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所作的计算。

9. 从外债脆弱性的角度来看,私营部门债务的激增带来三大风险。第一,以外币签约的私人债务最终代表对一国国际储备的债权,在私人实体无法利用外币资产对冲外币负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第二,即使私人债务以本币计价但由外部债权人持有,外部信贷流动的突然逆转也有可能削弱债务可持续性。第三,如果外生冲击导致大规模破产或借款人信誉出现系统性恶化,则高额的国内私人债务(以本币发行并由居民持有)会成为公共部门财政的或有负债。

10. 发展中国家私人无担保外债的比例(见图一)仅部分反映了上述风险,这部分债务只包括由外部债权人持有的长期私人债务。该比例从2000年的26%升至2009年的47%,表明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比例降低、私人无担保外债比例上

² 见《2019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为全球绿色新政筹资》(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9.II.D.15),第四章;《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20.I.4),第三.E章。

升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此后，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新兴市场繁荣时期，私人无担保外债占长期外债总额的比例一度高达 52%，但最终在 2019 年回落至 48%。一些估计显示，在不包括中国的 26 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约三分之一的非金融部门公司债务由外部债权人持有，数额达到 1.8 万亿美元，主要以外币计价。³ 令人关切的是，公司负债的激增似乎并未促进生产性投资。⁴

11. 此前的报告指出，⁵ 在发展中经济体资本账户广泛实现自由化和国际金融市场放松管制的背景下，因全球金融投资者寻求较高短期回报而形成的全球“推动因素”是造成金融脆弱性上升的共同推力。这一情况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大规模实施货币宽松、维持近零利率的环境中愈演愈烈。除了瞄准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中主要由本国境内公司发行的新兴市场外币计价证券外，国际金融投资者还更多地参与扩大以本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多达三分之一的内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⁶

12. 与此同时，许多前沿经济体⁷ 日益依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外币计价债券。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就有 21 个国家在 2020 年初有相当于 1 150 亿美元的主权欧洲债券尚未偿还，此前这类债券的发行量在 2017 年后大幅增加。⁸ 总体而言，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所有权构成以及受此影响的风险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在此类债务中，由私人债权人而非官方债权人持有的比例从 2009 年底的 46.3% 升至 2018 年底的 62.4%，应偿还债券持有人而非商业银行的比例在同期从 60.2% 升至 76.1%。⁹

13.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被动管理、基准驱动的金融投资策略增加，导致金融脆弱性加剧的趋势更为严重。¹⁰ 此类策略是以跟踪摩根大通新兴市场主权债券指数、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股票指数、摩根大通新世代市场指数等旗舰基准指数为基础，这些指数旨在为金融投资决策提供信息。许多前沿经济体已被纳入上述指数当中，这在此类经济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方面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¹¹

³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Global Debt Monitor Database, April 2020.

⁴ 《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 82 页。

⁵ 例如，见 A/73/180 和 74/234。

⁶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第三.E 章，第 150 页。

⁷ 基金组织将前沿经济体界定为在进入国际市场方面与新兴市场类似的经济体。见基金组织，“低收入经济体公共债务脆弱性的演变”，政策文件，第 20/003 号(2020 年 2 月 10 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 46 页。

⁸ Gregory Smith, “Can Africa’s wall of Eurobond repayments be dismantled?”, M&G Investments, 29 January 2020.

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债务统计数据库的数据所作的计算。可获得的最新数据是 2018 年的数据。

¹⁰ 例如，见 Ken Miyajima and Ilhyock Shim, “Asset manager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14)。

¹¹ 摩根大通新世代市场指数是跟踪前沿经济体发行的美元计价政府债券的主要基准指数，在 2011 年推出时仅包含 17 个国家。到 2020 年 4 月，其包含的国家数增至 36 个(3 个高收入发展中国家

14. 基准驱动的金融投资策略容易诱发从众行为。全球投资者的大部分金融财富由少数资产管理，这些基金关注的重点是对新兴经济体和前沿经济体整体造成影响的发展动态，而非各国的具体特点。这些基金还依赖基于类似方法、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基准指数。因此，基准驱动的投资策略对全球金融状况的变化高度敏感，而且往往会触发投资组合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同步流动，从而放大这种变化。此类策略并非只影响被动基金管理，因为“主动”基金的目标是获得比被动投资策略更高的收益。一些估计显示，多达 70% 的投资基金国家配置受基准指数影响。¹²

15. 在“拉动因素”方面，尽管商业融资的总体风险水平较高，但发展中国家对其日益依赖，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获得更多具有发展性质的外部筹资来源。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其如此。众所周知，中等收入国家面临所谓的“缺少中等发展阶段资金”的问题，以往报告已对此作出重点说明。这一问题指的是，中等收入国家按人均收入门槛值衡量，已不再享有获得外部优惠筹资的机会，但仍然需要长期外部发展融资。¹³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最近按现金制计算的官方发展援助总净额下降是造成其依赖商业融资的因素之一。在计量方法从现金流量法改为赠款等值法后，2019 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比 2018 年增加了 1.4%。与此同时，此类援助占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 2018 年的 0.31% 降至 2019 年的 0.30%。¹⁴ 此外，近年来官方发展援助日益从中央预算支助转向捐助方国内费用以及气候融资等更广泛的多边优先事项，进一步增加了低收入国家对商业发展融资的依赖。¹⁵

16. 这些问题在官方债权人持有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构成上得到反映。虽然官方债权人在这类债务中持有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53.7% 降至 2019 年的 37.6%，但在这一总体比例下降的过程中，多边和双边官方债权人所占的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分别为 60% 和 40%。不过，双边债权人的构成从巴黎俱乐部债权人转向中国提供的双边借贷。¹⁶ 这表明，除商业筹资外，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南南金融合作。而这种现象本身也有风险，特别是有抵押债务、包括与大宗商品挂

家、25 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2 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6 个转型期经济体、4 个最不发达国家和 2 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¹² Tomas Williams, Claudio Raddatz and Sergio L. Schmukler, “International asset allocations and capital flows: the benchmark eff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108, issue C, pp.413-430.

¹³ 例如，见 A/74/234。

¹⁴ 详情见“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第三.C 章，第 82-84 页；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官方发展援助”。可查阅 <https://developmentfinance.un.org/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现金流量法将贷款面值全部计为官方发展援助，在偿还贷款时从中扣除还款额。新的赠款等值法使用优惠借贷额计算贷款的赠款部分，而不计入全部面值。未来还款额不会从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中扣除。

¹⁵ 例如，见 TD/B/EFD/3/2。

¹⁶ Sebastian Horn, Carmen Reinhart and Christoph Trebesch, *China's Overseas Lend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26050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ly 2019)。

钩的贷款使用量增加所产生的风险。与此同时，正如最近的研究重点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重组此类债务的难度可能比过去更大。¹⁷

17. 最后，广泛使用混合筹资可能加剧上述金融脆弱性。混合筹资可以宽泛地界定为利用国际公共资金带动私人资金为发展项目供资。虽然混合筹资在消除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缺口方面发挥的作用迄今仍低于预期，¹⁸ 但自 2009 年以来，混合筹资稳步增长，优惠债务或股权是混合筹资结构中最常用的金融工具。¹⁹ 这些工具带有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和之后与“金融工程”相关的许多风险，特别是可能给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带来巨额或有负债。

B. 各国家组的主要外债趋势

18. 虽然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所谓的第四波债务潮比前几次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具有更广泛的基础，²⁰ 但各国家组在外债的构成和发展趋势方面仍有差异。

19. 2019 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总额达到 1 630 亿美元，几乎是 2009 年的两倍。2019 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率达到 33.1%，高于 2012 年的 25.1%，即观察期内的最低点。2019 年，这些国家的外债存量几乎是出口收入的两倍(173.5%)，而 2011 年的这一比例为 99.6%。这些国家外债所有权构成方面的主要特征是，过去 10 年私人无担保外债的年增长率较高，接近 20%。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相比，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无担保外债占长期外债总额的比例仍然较低，在 2019 年达到 13%，高于 2009 年的 4%，但上升趋势明显。积极的一面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体构成已经从短期债务转向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11% 降至 2019 年的 6%。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私人无担保外债的比例上升。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也呈现出风险升高的特点，如前文所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低收入国家尤其如此。

20. 疫情暴发时，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外债可持续性方面的整体脆弱性反映在 COVID-19 危机之前不断上升的偿债成本上。2019 年，这些国家的外债偿还成本占出口收入的比例达到 10.1%，这一数字仅略低于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初债务危机最严重时的水平，与 2012 年记录的 3.4% 相比，几乎增加了两倍。2019 年，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比例达到 7.9%，略低于 2018 年(8.1%)，但总体上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因为 2010 年代初的数字要低得多(2012 年为 3.3%)。

¹⁷ Kevin Acker, Deborah Brautigam and Yufan Huang, “Debt relief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No.39(Washington, D.C., John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2020)。

¹⁸ 见 [TD/B/EFD/3/2](#)。

¹⁹ Convergence, *The State of Blended Finance 2019* (Toronto, Canada, September 2019)。

²⁰ M. Ayhan Kose 等,《全球债务潮——前因后果》(世界银行集团, 2020 年,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1. 就在疫情暴发前，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同样处境脆弱。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外债存量在 2009-2019 年期间的年增长率(7.8%)高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6.6%)，该存量在 2019 年达到 2.2 万亿美元。另一方面，一段时间以来，这些外债的构成更加明显地向风险较高的方向倾斜。私人无担保外债占长期外债总额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14%增至 2009 年的 30%和 2019 年的 34%。与此同时，到 2019 年，43%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由私人债权人而非官方债权人持有，34%由债券持有人而非商业银行持有。这些不断增加的私人 and 主权债券债务中有许多是以外币持有，这种情况在最近纳入摩根大通新世代市场指数的前沿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对前沿市场债券(期限通常比短期债务长)的强劲需求意味着，2019 年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在 2009 年 15%的基础上仅略有上升，达到 17%。

22. 与此同时，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储备缓冲进行自保、抵御外生冲击的能力进一步减弱，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从 2009 年的 677%降至 2019 年的 400%左右。这组国家通过创造外汇收入偿还不断增加的外债欠款的能力也继续下降，外债与出口额之比从 2011 年的 79.5%升至 2019 年的 117.6%。

23. 这一总体状况导致偿还外债负担的成本上升，该成本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8.3%攀升至 2019 年的 15.6%。虽然 2012 年政府收入的 4.4%用于偿还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但到 2019 年，这一数字翻了一番，达到 8.9%。在考虑由低收入和最脆弱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不发达国家组时，偿债成本的上升甚至更加明显，因为这组国家的定义不仅基于人均收入标准，还基于更广泛的结构发展指标。在观察期之初，从出口收入和政府收入来看，这组国家的偿债成本与所报告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所有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成本均相差不大，但此后却大幅上升。偿债成本占出口收入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5%升至 2019 年的 14.4%，几乎增加了两倍。政府收入中用于偿还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4.9%升至 2019 年的至少 17.2%。

24. 高收入发展中国家(不含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上文讨论的发展中国家整体更加依赖商业性外部筹资的许多趋势在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更加深厚的国内金融和银行体系。但在大规模全球冲击(如这场疫情)的背景下，这也意味着，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具有潜在的脆弱性。2019 年，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总额继续上升至 6.8 万亿美元，高于 2018 年的 5.9 万亿美元，是 2009 年的两倍多。这意味着，自 2019 年以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比例从 2009 年的 22.3%升至 28%。但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私人无担保外债占长期外债总额的比例大大高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2019 年这一比例达到 53%)，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短期债务相对于长期外债的比例也更高(2019 年短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 34%)；在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有可能削弱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

25. 因此，一段时间以来，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增速一直低于外债存量增速，导致外债与出口额之比从 2009 年的 75%升至 2019 年的 106%。按用于偿还公共外债的政府收入计算，偿债成本从 2014 年的 1.9%(观察期内最低水平)

升至 2019 年的 3.3%。这些数字虽然呈上升趋势，但反映出这组国家具有较强的出口活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一些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投资级地位的借款人数量较多。即便如此，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抵御国际流动性突然紧缩的能力仍有下降，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从 2009 年的 520% 明显降至 2019 年的 246%。

26. 鉴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经常遭受自然灾害，其外债可持续性恶化的问题多年来一直令人关切。自从之前的相关报告发布以来，²¹ 这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改变。2019 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存量达到 504 亿美元，自 2009 年以来增加了约 70 个百分点。因此，这些国家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从 2009 年的 50.7% 和 2018 年的 60.5% 升至 2019 年的 61.7%。外债存量增速也持续高于出口收入增速，导致 2019 年外债与出口额之比升至 172.4% (2011 年为 99.6%，2018 年为 158.8%)。虽然自 2015 年左右达到债务峰值以来，其他指标保持相对稳定，但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抵御外生冲击的自保能力进一步下降，国际储备与短期债务之比从 2009 年已经较低的 307% 降至 2019 年的 209%。这组国家尤其将受到 COVID-19 危机爆发后国际旅游业崩溃的严重影响。

27. 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债总体可持续性继续改善。尽管 2019 年这些经济体的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仍高于其他区域，达到 39.4%，但这一数字自 2015 年以来持续下降。与此同时，长期债务占外债总额的比例上升，私人无担保外债的比例下降，储备与短期外债之比仍然较高，自 2015 年以来远高于 500%。但这组国家的偿债成本也在上升。2019 年的偿债成本与出口收入之比为 20.3%；自 2018 年以来，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成本与政府收入之比约为 10%。上述情况以及核心组别指标自 2009 年以来波动较大的表现(与其他国家组不断恶化的趋势相反)说明，这一组别的内部构成存在差异。其成员包括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在内的各类国家，往往具有截然不同的结构特征。

三. COVID-19 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

28. COVID-19 的冲击正是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债务脆弱性居高不下、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逐渐显现的。从规模和性质来看，COVID-19 危机至少是近年来绝无仅有的危机。这场危机与之前的金融危机不同；为应对之前的危机，各国广泛采取紧缩政策，造成总需求萎缩。虽然 COVID-19 的冲击首先是全球卫生危机，但由于全球各地的经济活动大规模长期停摆，供应也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投资和家庭支出减少可能导致全球总需求大幅下滑，国际金融市场也呈现出严重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足以避免公司连锁破产和失业，这场横跨卫生、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综合危机造成的损失可能是永久的，而非暂时的。²²

²¹ 见 A/73/180 和 A/74/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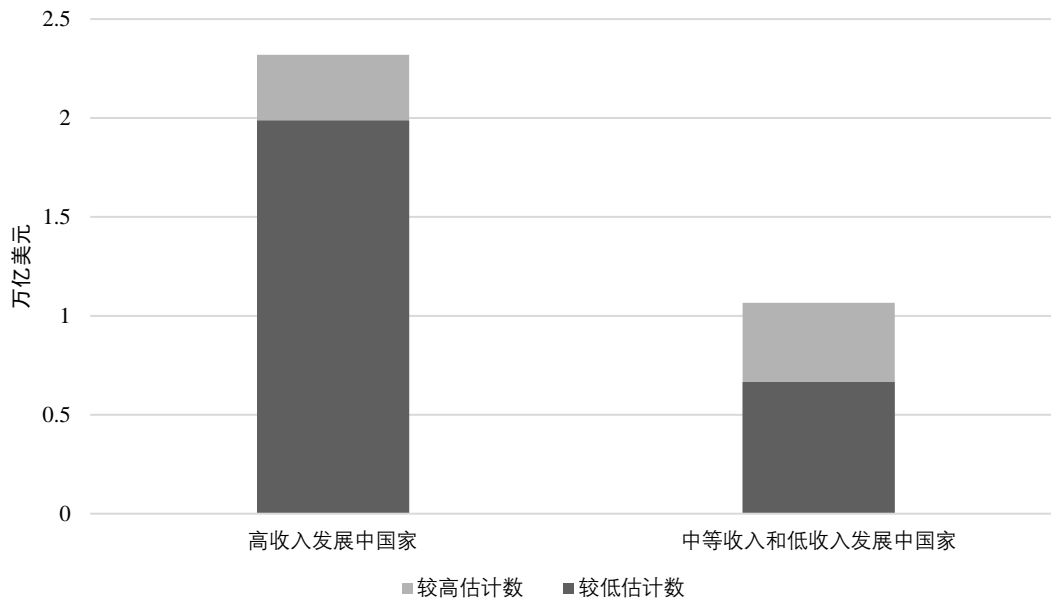
²² 另见贸发会议，“2019 冠状病毒病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掉队者制定‘全力以赴’的方案”，《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2020 年 3 月)。

29. 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推出了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大规模一揽子方案，通过债务融资实现财政稳定。考虑到所需的规模，发展中国家无法选择这一做法。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在 COVID-19 紧急情况出现后采用最后贷款人政策支持经济，²³ 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要采取此类措施，就必须承担本币对硬通货大幅贬值的风险。因此，考虑到 COVID-19 危机的规模，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国际储备缓冲较少的国家仍然严重依赖硬通货形式的短期国际流动性支持。

30. 对于疫情暴发时有沉重外债负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情况更加严峻。如图四所示，由于上一节讨论的债务和金融脆弱性累积的现象，发展中国家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就需要偿还巨额的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两年的偿债规模在 2 万亿至 2.3 万亿美元之间，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规模在 7 000 亿至 1.1 万亿美元之间。

图四
2020 年和 2021 年发展中国家公共外债偿还时间表

(按现值计算的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季度外债统计数据库、国际金融协会《全球债务监测》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数据所作的计算。²⁴

²³ 例如，见 Yavuz Arslan, Mathias Drehmann and Boris Hofmann, “Central bank bond purcha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BIS Bulletin* No.20 (Basel, Switzerland, 2 June 2020)。

²⁴ 在估算所有发展中国家 2020 年和 2021 年公共外债偿还时间表的范围时，合并了 44 个发展中国家(包括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偿还时间表，以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估计偿还额(考虑到其收入组别)。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一收入组别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外债偿还时间表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同步性，这主要由国际金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金融状况决定。较低和较高估计数分别指数据分布的下限和上限，其定义是第 10 个和第 90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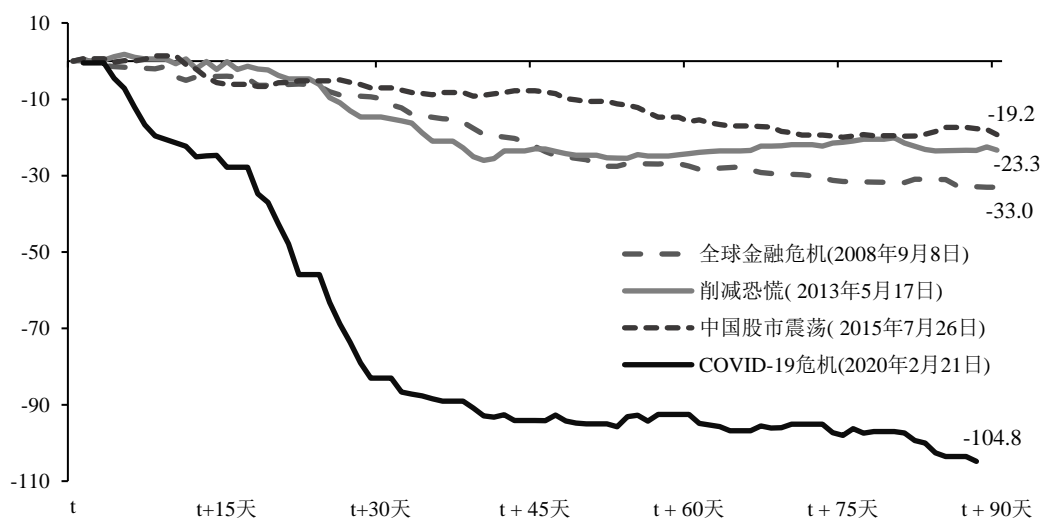
31. 在“正常”时期，其中许多债务将根据对未来债务可持续性的评估予以展期，以便偿还债务欠款和利息。但在 COVID-19 时期，这场危机至少有四个主要传导渠道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可持续性面临系统性崩盘的风险。²⁵

32. 第一，如图五所示，因疫情导致的发展中国家非居民资本外逃现象大大超过以往金融危机期间资本流动的逆转情况。这种逃向安全资产的现象在发展中区域广泛发生，加剧了大规模的货币贬值，扩大了主权债券利差，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同步采取的基准驱动型组合投资策略扩大了发展中国家非居民资本外逃的规模和全球辐射范围。²⁶ 此类投资组合资本外流现象在资本流动与价格之间呈现出顺周期的动态关系，即最初的外流引发资产价格暴跌和汇率贬值，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投资组合资本外流。信用评级机构在此过程中下调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评级，更强化了这种动态关系。虽然自 4 月以来，最初因疫情导致的投资组合资本外逃现象有所减缓(见图五)，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亚洲各国政府和公司购买当地资本市场上的本币计价证券和国际债券。²⁷

图五

发展中国家非居民投资组合资本外流累计净额：不同危机的比较

(按现值计算的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每日新兴市场投资组合数据库所作的计算。

²⁵ 见贸发会议，“从大封锁到大崩溃：2019 冠状病毒病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债务”，《贸易和发展报告更新》(2020 年 4 月)。

²⁶ 例如，见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成熟信贷周期的脆弱性》(2019 年 4 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²⁷ Primrose Riordan and Thomas Hale, “Asian governments boost dollar borrowing to fight coronavirus”, *Financial Times*(London), 8 May 2020.

33. 第二，COVID-19 的冲击对国际贸易量和贸易额的所有负面影响将大大减少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外汇收入的机会。据估计，与 2019 年第二季度相比，2020 年第二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史无前例地下降了 18.5%。²⁸ 金融价格投机和全球总需求的减少尤其影响到依赖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最大的是石油，紧随其后的是铜等其他矿产。此外，国际旅游业(贸易服务)几乎崩溃，而这一行业多年来一直是许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命线。

34. 第三，作为许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外汇流入的重要来源，汇款在 2019 年达到创纪录的 5 540 亿美元，但预计将在 2020 年下降约 20%。²⁹

35.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通常是较为稳定的外部筹资模式，但与 2019 年相比，此类投资预计将在 2020 年减少多达 40%。³⁰ 除投资计划缩减外，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出现跨国企业附属公司外汇流出增加的现象，因为有更多的特许权使用费、红利和利润汇款转移到面临收入下降困境的总部。

36. 这些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袭来，对本来就深受制约的国际收支造成影响，而国内公共预算也面临与危机有关的压力。国内公共预算面临的这些压力首先源于经济封锁造成的公共收入减少，以及为应对疫情的影响而增加的卫生和社会支出。鉴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薄弱，要调动国内资源应对疫情的影响，就必须额外付出更大的努力。此外，如果公私伙伴关系和其他混合筹资工具解体(COVID-19 造成冲击后可能发生这种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具有战略作用、背负沉重债务的国有企业又无法对未偿债务进行再融资，则公共当局在“正常”时期产生的或有负债可能变为现实，这在危机时期相当常见。由于在发展中国家，硬通货债务通常以主权债务状况的变化为基准，一旦情况恶化到这一程度，私营企业的外部筹资成本也可能大幅上升，从而使公司债务的总体可持续性降低。

37. 总之，除非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作出适当反应，否则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及其总体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将引发恶性循环：应对 COVID-19 危机的财政空间有限，外债可持续性指标恶化，信用评级机构下调评级，主权债券利差扩大，然后资本进一步外流，从而导致遭受重创的发展中经济体用于应对 COVID-19 危机的财政空间更加狭小。截至编写本报告时，疫情在一些发展中区域的势头不减反增，整个发展中世界很可能发生连锁主权违约。³¹

²⁸ 世界贸易组织，“2020 年上半年贸易量急剧下滑”，新闻稿，2020 年 6 月 22 日。

²⁹ 世界银行，《透过移民视角看待 2019 冠状病毒病危机》，移民与发展简报第 32 期(2020 年 4 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³⁰ 《2020 年世界投资报告：疫情之后的国际生产》(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20.II.D.23)。

³¹ 基金组织，《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更新》(2020 年 6 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四. 政策建议：从紧急债务减免到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债务可持续性的持久解决方案

38. 如上所述，在应对 COVID-19 危机和确保稳健恢复方面，发展中国家首先需要获得大规模的流动性支持。根据基金组织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危机初期的估计，这方面的需求至少为 2.5 万亿美元。由于疫情仍在蔓延，这些早期估计数可能最终会低于实际需求，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后来所作的估计表明了这一点。债务减免对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性需求作用有限。此外，越多地采用新增借款的形式提供此类流动性支持(即使是给予优惠条件)，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处于脆弱状态的年限就越长，这将对落实《2030 年议程》产生广泛影响。即便如此，精心设计的债务减免方案依然至关重要，因为此类方案不仅能够缓解眼前的流动性压力，还可能解决结构性的资不抵债问题和长期债务可持续性问题。

39. 目前，基金组织通过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基金免除了 27 个最贫困发展中经济体在 6 个月内应当偿还基金组织的债务款项，免除数额估计为 2.15 亿美元。³² 但为国际社会目前就 COVID-19 采取的债务减免做法奠定基调的是二十国集团在 4 月 15 日通过的最贫困国家暂停偿债倡议。根据该倡议，73 个以低收入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有资格在 2020 年 5 月至 12 月期间暂停向双边债权人偿债，前提是这些国家在基金组织拥有有效的借款地位(包括向基金组织提出在今后提供资金的请求)、能够证明暂时腾出的资源用于增加卫生和经济支出以应对 COVID-19 危机，并接受全面披露本国的公共债务欠款(可能排除商业敏感信息)。³³ 据估计，该倡议涵盖了有资格的国家所欠的 120 亿美元双边债务；据报告称，截至 6 月中旬，这些国家中已有略多于一半的国家从这项倡议中受益。二十国集团呼吁私人债权人以类似条件加入该倡议，并请多边开发银行考虑在不妨碍维持目前较高信用评级的前提下加入其中。相关的背景情况是，2018 年底，符合该倡议所列资格的国家拥有共计 4 573 亿美元的长期公共外债和公共担保外债存量，其中欠双边债权人的债务额为 1 743 亿美元。³⁴

40. 该倡议为一些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急需的临时喘息空间，虽然受到欢迎，但也凸显了在 COVID-19 暴发之前和之后推动全面解决发展中国家外债可持续性不断恶化问题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其中尤为突出的障碍是，促进私人债权人加入债务减免的进展断断续续，³⁵ 而且迄今各方对新的多边债务减免倡议缺乏兴趣。鉴于少数私营信用评级机构对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入市条件有深远影响，会员

³² 例如，见 Jubilee Debt Campaign, “Reaction to \$125 million of debt cancellation by IMF” (14 April 2020)。

³³ Group of 20, “G20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 governors meeting, 15 April 2020 (virtual)”, communiqué(15 April 2020), annex II.

³⁴ 见贸发会议，“从大封锁到大崩溃”，第 8 页。

³⁵ 见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letter to IMF,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ub on a potential approach to voluntary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1 May 2020。

国应考虑在法规等领域制定措施，通过促进增加竞争、采取步骤避免利益冲突并提高评级质量，以及在透明度方面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等方式，减轻对这些机构所作评估的机械性依赖。³⁶ 还可考虑由一家公共控制的信用评级机构发挥潜在作用。

41. 此外，随着各类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可持续性迅速恶化，需要采取果断行动，有效扩大现有各项举措的范围。³⁷ 在此过程中，应纳入以下措施：

(a) **延长并扩大临时债务冻结。**要在宏观经济层面为陷入危机的发展中国家立即提供喘息空间，以便应对 COVID-19 危机并从其影响中恢复，就必须实施临时冻结。应在收到请求时给予发展中国家此类冻结，而不考虑基于收入的标准或其他资格标准；此类冻结应全面覆盖所有类型的债权人(多边、双边和私人)，并应视需要每年自动延续。为防止因暂停向一些债权人偿债而腾出的资源被用于向其他不合作的债权人偿债，全面覆盖各类债权人至关重要。如果将所有债权人都纳入其中，而且新的情况显然可以持续，则信用评级机构对请求援助国的评估可能会有所改善；³⁸

(b) **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在采取更灵活的临时冻结做法后，应当利用由此所获得的喘息空间，评估哪些国家需要更深入的主权债务重组。这不仅是为了使这些国家重新具备能够在短期内偿还债务欠款的能力，也是为了确保对偿还能力的要求与以下方面协调一致：(a) 可持续地恢复包容性增长、财政和贸易平衡轨迹；(b) 因按时落实《2030 年议程》而产生的投资需求；

(c) **债务互换。**一些债务负担沉重但仍可维系的国家正在疲于应对 COVID-19 危机造成的直接影响。对于这些国家，可采用债务与 COVID-19 抗疫资金互换的形式，提供与更深入的主权债务重组相比程度较浅的债务减免。债务互换方案可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债务构成问题，特别是商业债务较多和公共债务存量庞大的问题。必须就具体模式达成一致，这些模式可大致仿效现有的债务互换方案；

(d) **官方发展援助领域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重组这些国家对官方债权人的现有债务，以改善优惠条件并降低偿债成本时，可通过扩大官方发展援助的方式，为此类即时债务减免提供资金。或者可制定官方发展援助领域的“马歇尔计划”，调动过去尚未兑现的官方发展援助承诺，为受

³⁶ 见大会第 74/202 号决议。

³⁷ 见贸发会议，“从大封锁到大崩溃”，第 9-12 页；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冠状病毒病与主权债务”，政策简报第 72 号，2020 年 5 月 14 日；联合国，“债务与 COVID-19：全球团结应对”，2020 年 4 月 17 日。

³⁸ 例如，见 Patrick Bolton and others, “Born out of necessity: a debt standstill for COVID-19”。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Policy Insight Nr. 103(April 2020)。作者在其提议中认识到，没有任何既有的国际机制可用于推动私人债权人全面参与债务冻结，并建议在世界银行和(或)区域开发银行中为请求获得临时冻结援助的国家设立中央信贷机制。从本质上讲，此类安排将激励私人债权人参与冻结，因为它会在清偿顺序方面提供国际支持，保障参与冻结的私人债权人在未来全额收回未偿债务，从而使不合作的私人债权人处于劣势地位，同时在一开始就允许使用通过临时冻结腾出的资金应对危机。

援国与 COVID-19 有关的卫生支出提供特别资金，从而间接促进减轻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

42.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必须开展更深入的主权债务重组；为了按计划落实《2030 年议程》，尤其应当采取这一做法。³⁹ 在迅速、公平、全面解决主权债务负担不可持续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此类问题方面，现有的国际架构不成体系，存在众所周知的缺陷。这些缺陷因 COVID-19 危机而更加凸显，其中包括：以往的债务重组具有“太少、太迟”的性质；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大力鼓励采取顺周期紧缩政策，破坏了未来增长前景和债务可持续性；从坚持不让步的债权人引发的问题可以看出，用于处理不同债权人利益的机制日渐分裂。⁴⁰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自 1970 年以来，在与私人债权人有关的主权债务重组事件中，近一半的债务人在 3 至 7 年内再次出现违约，60%在之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重组。⁴¹

43. 因此，国际社会应当立即加紧努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弥补这些缺陷。除二十国集团暂停偿债倡议和相关提议等紧急措施外，此类努力还应侧重于改善基于市场的机制和多边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问题提供持久解决方案，从而支持发展。改进基于市场的办法，如使用单一集体行动条款⁴² 控制坚持不让步的私人债权人、更有系统地使用状态依存型债券，以及纳入触发自动临时冻结的灾难条款，可有助于降低今后主权债务重组的成本，在有大量商业债务、特别是债券债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这种在合同层面作出的改进无法为此类重组的总体目标和评估债务可持续性的相关基本方法制定指导方针。考虑到 COVID-19 危机，最重要的任务似乎是推进更广泛的多边体制框架，提供透明机制，以促进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全面协调，并确保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任何主权债务重组都有利于全体相关公民的福祉。

44. 联合国是为预防和解决主权债务危机而推动债权人和债务人对话的长期论坛。⁴³ 本组织之所以享有这一地位，是因为联合国本身不是债权人，并提供了包容、民主的讨论空间。⁴⁴ 联合国是支持相关国际行动议程的适当平台，有助于提出持久解决方案，协助发展中国家在疫情之后实现外债可持续性并落实《2030 年议程》。2019 冠状病毒病时代及其后发展筹资高级别活动⁴⁵ 为开展包容各方的审议工作、支持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空间。

³⁹ 另见 A/74/234。

⁴⁰ 见《2015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使国际金融架构为发展服务》(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5.II.D.4)，第 132-140 页。另见《2019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第 96-101 页。

⁴¹ Martin Guzman，“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方案：这一次会有所不同吗？”，在第十二届贸发会议债务管理会议上所作的专题介绍，2019 年 11 月 19 日，日内瓦。

⁴² 例如，见 Mark Sobel，“Merits of single-limb CACs”，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 9 July 2018。

⁴³ 见大会第 69/319 号决议。另见贸发会议，“促进负责任主权借贷的原则”(2012 年 1 月 10 日)；贸发会议，“主权债务解决方案：展望未来——路线图和指南”(2015 年 4 月)。

⁴⁴ 见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9 冠状病毒病与主权债务”。

⁴⁵ 见联合国，“2019 冠状病毒病时代及其后的发展筹资”，可查阅 www.un.org/en/coronavirus/financing-development。

附件

发展中国家外债

(十亿美元)

	2009-2019 年 平均值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a
所有发展中国家					
外债存量总额 ^b	7 722.0	8 387.6	9 233.7	9 712.5	10 057.0
长期外债	5 407.1	6 145.3	6 634.4	6 842.2	7 110.5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49.7%	48.1%	50.6%	51.4%	52.0%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0.3%	51.9%	49.4%	48.6%	48.0%
短期外债	2 166.8	2 110.4	2 455.8	2 698.8	2 752.8
外债偿还总额	923.6	1 087.0	1 145.0	1 271.0	1 328.9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6.9%	28.9%	29.1%	28.9%	29.0%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c	94.8%	113.5%	110.9%	105.1%	110.6%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2%	3.7%	3.6%	3.8%	3.9%
偿债总额/出口额 ^c	11.4%	14.7%	13.7%	13.8%	14.6%
储备/短期债务	354.6%	334.0%	302.5%	273.6%	278.8%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3.7%	4.2%	4.1%	4.5%	4.7%
高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外债存量总额 ^b	5 072.9	5 523.9	6 160.2	6 593.1	6 768.7
长期外债	3 211.1	3 720.8	4 052.5	4 217.9	4 364.2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44.7%	43.0%	44.9%	46.0%	47.0%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55.3%	57.0%	55.1%	54.0%	53.0%
短期外债	1 799.7	1 753.6	2 055.7	2 295.8	2 313.5
外债偿还总额	591.7	727.4	780.2	838.7	871.3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5.4%	27.1%	27.8%	27.9%	28.0%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88.2%	103.5%	104.0%	101.4%	106.3%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0%	3.6%	3.5%	3.6%	3.7%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10.4%	13.6%	13.2%	12.9%	13.7%
储备/短期债务	329.9%	311.2%	275.0%	244.3%	245.7%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2.7%	3.0%	3.2%	3.1%	3.0%
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外债存量总额 ^b	1 590.1	1 747.8	1 948.2	2 051.6	2 175.2
长期外债	1 300.7	1 447.3	1 606.4	1 702.1	1 803.1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65.5%	64.1%	65.7%	66.2%	66.1%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4.5%	35.9%	34.3%	33.8%	33.9%
短期外债	241.5	252.6	287.1	292.7	308.6

	2009-2019 年 平均值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a
外债偿还总额	177.9	225.5	213.9	241.1	289.7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6.0%	27.1%	27.8%	28.4%	28.4%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100.3%	121.2%	117.0%	110.5%	117.5%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8%	3.5%	3.1%	3.3%	3.8%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11.1%	15.6%	12.8%	13.0%	15.6%
储备/短期债务	464.7%	418.9%	405.5%	385.5%	402.3%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6.3%	7.7%	6.7%	7.4%	8.9%
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					
外债存量总额 ^b	115.5	129.1	143.1	148.7	163.1
长期外债	98.8	112.1	124.9	130.6	143.0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91.4%	90.1%	90.4%	90.7%	87.4%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8.6%	9.9%	9.6%	9.3%	12.6%
短期外债	8.0	8.7	9.3	9.2	8.6
外债偿还总额	5.0	5.9	6.3	7.6	9.2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29.6%	32.0%	33.3%	31.9%	33.1%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141.6%	181.7%	170.9%	158.8%	171.1%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1.2%	1.5%	1.5%	1.7%	1.9%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6.2%	8.6%	7.9%	8.4%	10.1%
储备/短期债务	658.3%	509.8%	561.0%	564.5%	641.7%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5.3%	6.6%	6.6%	8.1%	7.9%
转型期经济体					
外债存量总额 ^b	943.5	986.7	982.1	919.0	950.0
长期外债	796.6	865.1	850.6	791.7	800.2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9.2%	37.5%	43.2%	41.6%	41.2%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60.8%	62.5%	56.8%	58.4%	58.8%
短期外债	117.7	95.4	103.7	101.2	122.1
外债偿还总额	149.0	128.1	144.5	183.7	158.8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40.4%	53.5%	44.8%	39.6%	39.7%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129.3%	184.2%	149.9%	116.2%	122.6%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6.5%	6.9%	6.6%	7.9%	6.6%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20.7%	23.9%	22.1%	23.2%	20.5%
储备/短期债务	500.2%	514.3%	541.7%	593.6%	571.4%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6.4%	7.4%	6.2%	10.3%	9.4%

	2009-2019 年 平均值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a
最不发达国家					
外债存量总额 ^b	272.2	309.4	336.4	356.6	378.0
长期外债	230.5	267.5	290.1	312.8	330.8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84.8%	82.1%	84.4%	84.3%	85.1%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15.2%	17.9%	15.6%	15.7%	14.9%
短期外债	27.9	29.7	33.3	30.1	29.5
外债偿还总额	17.9	21.3	22.5	25.9	33.5
债务比率^c					
外债存量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30.3%	32.1%	31.1%	33.9%	34.6%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129.2%	163.1%	151.2%	148.7%	159.8%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1.9%	2.2%	2.1%	2.5%	3.1%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8.5%	11.4%	10.3%	11.0%	14.4%
储备/短期债务	404.1%	406.1%	379.6%	414.8%	449.2%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8.5%	10.8%	9.2%	11.7%	17.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外债存量总额 ^b	40.8	43.8	45.7	48.6	50.4
长期外债	29.9	31.4	32.5	35.3	37.1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65.7%	70.3%	71.9%	67.8%	64.9%
私人无担保债务/长期外债	34.3%	29.7%	28.1%	32.2%	35.1%
短期外债	9.3	10.7	11.5	11.7	11.5
外债偿还总额	6.1	5.0	6.5	6.6	7.0
债务比率^c					
外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55.0%	60.7%	60.5%	60.5%	61.7%
外债存量总额/出口额 ^d	155.3%	171.0%	166.9%	165.2%	172.4%
偿债总额/国内生产总值	8.2%	6.9%	8.6%	8.2%	8.5%
偿债总额/出口额 ^d	24.7%	21.8%	23.4%	22.9%	24.3%
储备/短期债务	235.0%	208.4%	205.3%	200.8%	208.8%
公共债务和公共担保债务偿还额/政府收入	9.7%	13.5%	11.1%	9.8%	10.0%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国资料来源所作的计算。

注：各国家组是按贸发会议数据库分类方法界定的经济组别，可查阅：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Classifications.html>。“所有发展中国家”类别系指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转型期经济体国家。

^a 2019 年估计数。

^b 债务存量总额包括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和使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贷。

^c 用于计算比率的数据已根据各国数据可得性予以调整。

^d 出口额包括货物、服务和初次收入。